

## 从RCEP到CPTPP:差异、挑战及对策

余森杰 蒋海威

在推动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过程中，自由贸易区建设有利于中国进一步优化对外贸易结构，为新时期中国扩大对外开放构建新平台。继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后，中国表示将积极考虑加入《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PTPP）。本文首先呈现了中国与CPTPP成员国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的发展趋势，对其中的规律及特点进行归纳。接着比较分析了CPTPP与RCEP的差异，并结合中国经济发展状况总结了加入CPTPP可能存在的挑战以及具备的优势和能力。最后，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投资、知识产权保护、国企改革五个方面提出相关建议。

关键词：RCEP CPTPP 自由贸易协定 比较分析

2020年5月14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会议首次提出“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充分发挥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优势和内需潜力，构建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2020年5月“两会”期间，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要“逐步形成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〇三五年远景目标的建议》，将“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纳入其中。构建基于“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在国内外环境发生显著变化大背景下，推动中国开放型经济向更高层次发展的重大战略部署。尽管目前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经历百年一遇的疫情冲

余森杰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教授、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国家杰出青年基金获得者、北京市卓越青年科学家，Email: mjyu@nsd.pku.edu.cn；蒋海威系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博士后、助理研究员。

击，但是中国依然处于发展的重要战略机遇期。需要指出，新发展格局绝不是封闭的国内循环，而是开放的国内国际双循环，即经济外循环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

经济全球化的核心是贸易全球化。尽管贸易保护主义、贸易霸凌主义一直存在，但经济全球化进程没有终结，只是呈现出新形态，因为其中“生产地区化和贸易全球化”相结合的核心特征没有发生变化。从简单的铅笔到复杂的汽车，再到更复杂的大飞机，每个产品都是由不同国家或地区生产的零部件组成，再通过在某地集中装配，销往全球。<sup>[1]</sup>另外，全球经济和国际贸易结构正在发生变化。<sup>[2]</sup>比如，原来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多边经贸合作停滞不前，许多国家或地区开始与自己经贸联系紧密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经贸合作。现阶段，全球经济贸易展现出“三足鼎立”的版图：以德国为中心的欧盟地区，以美国为中心的美洲地区，以及以中国、日本为中心的亚太地区。因此，全球主要的多边贸易协议是现阶段国际贸易合作的基本态势。在全球多边经贸合作式微、地区经贸合作多边机制加强的背景下，中国在实现经济外循环方面的重点包括大力推进“一带一路”倡议落地、推动RCEP生效，积极参与CPTPP，助力中欧全面投资协定实施。

RCEP和CPTPP是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积极参与协定的商议和谈判是中国现阶段高水平开放的路径之一，也是目前亟待促进落实的工作。2020年11月15日，第四次RCEP领导人会议举行，东盟十国以及中国、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西兰共15个国家，正式签署《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egional Comprehensive Economic Partnership，简称RCEP），这标志着全球规模最大的自由贸易协定正式达成。RCEP现有15个成员国的总人口数量、经济体量、贸易总额均占全球总量约30%，意味着全球约三分之一的经济体量形成了一体化大市场，这将有力支持自由贸易和多边贸易体制，稳定区域产业链供应链，助推区域和世界经济恢复发展。RCEP有助于进一步扩大中国在地区的经济影响力，同时为中

---

[1] 以汽车生产为例，车身上的许多零件生产由不同国家和地区分工完成，然后再组装在一起卖到全球。这一现象并没有因为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反全球化而发生根本性改变，只不过原来是全球范围的多边合作，现在转变为地区经贸合作多边机制不断加强。

[2] 20世纪50-80年代，高收入国家之间的贸易占主导地位，且设置了很高的贸易壁垒。但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低收入国家在全球贸易中已经酝酿了几十年的崛起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例如，中国的经济转型在20世纪90年代开始加速，使得中国在该时期实现了劳动密集型产品的潜在比较优势。参见Hanson, G. H., “The Rise of Middle Kingdoms: Emerging Economies in Global Trade”, *Journal of Economic Perspectives*, 26(2): 41-64, 2012.

国未来参与其他潜在的自由贸易协定铺平了道路。<sup>[1]</sup>

2020年11月20日，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中方欢迎RCEP完成签署，将积极考虑加入CPTPP。《全面与进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Comprehensive and Progressive Agreement for 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CPTPP），是美国退出《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sup>[2]</sup>（Trans-Pacific Partnership，简称TPP）后对协议内容进行了部分冻结<sup>[3]</sup>后的新的区域自贸协定。2018年3月8日，参与CPTPP谈判的11国<sup>[4]</sup>代表在智利首都圣地亚哥举行协定签字仪式。当年12月30日，该协定正式生效。CPTPP是一个综合性的自由贸易协定，主要内容包括货物贸易、原产地规则、贸易救济措施、卫生和植物卫生措施、技术性贸易壁垒、服务贸易、知识产权、政府采购和竞争政策等。这一协定的签署将加强各成员经济体之间的互利联系，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和经济增长。根据世界银行数据，2019年，CPTPP覆盖5.08亿人口，占全球人口的6.62%；国内生产总值（GDP）为11.21万亿美元，占全球经济总量的12.77%；贸易总额约为7.30万亿美元，占全球贸易总额的14.80%。

由于自由贸易规则的差异，中国现阶段还需完善市场经济体制，以更良好的市场环境参与CPTPP。本文旨在对中国对外贸易现状和自贸协定规则进行梳理，围绕CPTPP的相关规则，分析中国需要如何应对。

## 中国贸易结构及趋势

21世纪以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纵深发展，全球国际贸易高速增长，其增长速度超过了世界经济增速。通过紧抓国际产业转移机遇、积极参与国际分工体系等方式，中国货物贸易进入了史上最快发展阶段。“十三五”期间，中国货物贸

[1] 2021年1月21日，商务部表示，中国将进一步扩大自贸网络的范围。愿与更多贸易伙伴商签自贸协定，共同推动贸易投资自由化便利化，比如，加快推进中日韩自贸协定谈判，推动与海合会、以色列、挪威等自贸谈判进程，积极考虑加入CPTPP。

[2] TPP最初是由亚太经济合作组织成员发起，旨在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自由化。2010年11月14日，亚太经济合作组织高峰会的闭幕当天，与会九国同意美国总统的提案，将于2011年11月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峰会完成并宣布TPP纲要。2017年1月23日，时任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美国退出TPP。

[3] 2017年11月11日，TPP改组为CPTPP，并将协定中22条由美国主张但他国多反对的条款冻结。

[4] CPTPP目前11个成员国分别为日本、加拿大、墨西哥、智利、秘鲁、新西兰、澳大利亚、新加坡、越南、文莱、马来西亚。

易规模多年位居世界第一，货物进出口总额占全球份额超过11%。此外，近年来，服务贸易在国际分工中的地位不断提升，服务环节的价值创造能力显著增强，全球服务贸易增长速度快于货物贸易。基于国际贸易发展新趋势，中国高度重视服务贸易发展，已经在多个地区开展服务贸易创新发展试点建设，鼓励试点地区在体制机制、发展模式、促进政策等方面开展探索试验，加快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本节首先对中国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趋势进行刻画，旨在了解中国在国际贸易方面的发展情况。其次，论述中国与CPTPP成员国的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情况，归纳总结贸易趋势和特点。

### （一）中国货物贸易与服务贸易趋势

#### 1. 中国货物贸易趋势

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精辟地分析了国内外形势，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一轮史无前例的市场化改革大潮。此后，中国加速了对外开放推向纵深，实施了“以质取胜”“市场多元化”“科技兴贸”三大战略，极大推动了中国货物贸易的增长。<sup>[1]</sup>2001年加入WTO以后，中国对大量与国际贸易相关的法律法规进行修改完善，进一步开放了市场，推动货物贸易迅猛发展。自2008年以来，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不断调整对外开放政策，对外贸易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2013年，中国首次超过美国，成为全球第一货物贸易大国，并且此后在不同年份中保持了这一地位。

从数据（见图1）上看，在货物贸易方面，中国进口、出口在若干年份出现不同幅度下降，但整体上保持高速增长。在进口方面，从1992年的771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2.1万亿美元，平均增长率达到13.4%。分阶段来看，1992—2001年、2002—2007年、2008—2020年三个阶段货物贸易进口总额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4.3%、25.8%、7.0%。在出口方面，从1992年的832亿美元增长到2020年2.6万亿美元，平均增长率达到13.9%。1992—2001年、2002—2007年、2008—2020年三个阶段货物贸易出口总额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4.4%、28.8%、6.6%。

[1] 陈文敬：“中国对外开放三十年回顾与展望（一）”，《国际贸易》，2008年第2期，第4~10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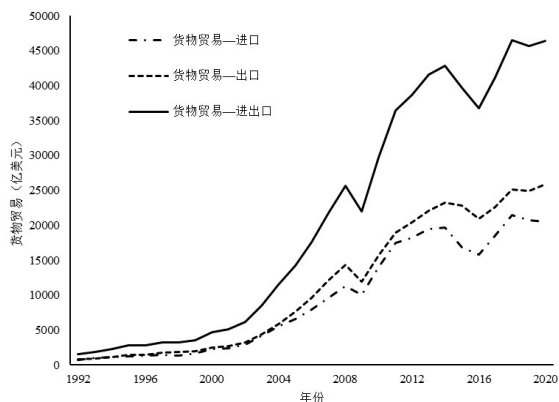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货物贸易趋势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数据库。

## 2. 中国服务贸易趋势

在国际贸易的发展历程中，服务贸易长期扮演着货物贸易的补充角色，发展速度相对较慢。随着科技创新的推动，服务贸易在国际贸易结构中的份额不断增加，服务全球化已经成为经济全球化的重要组成部分。<sup>[1]</sup>改革开放以后，中国建立并逐步完善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推动了服务业的发展。而随着对外开放程度的不断提高，中国抓住服务贸易发展的机遇，积极应对挑战，激发市场主体活力，推动服务贸易高质量发展。<sup>[2]</sup>2012年，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形成全面开放新格局，服务贸易是其中的重要一环。在高水平开放的道路上，推动服务贸易的发展是关键因素之一，有助于提升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

数据（见图2）显示，在服务贸易方面，中国进口、出口在个别年份小幅度下降，但持续增长的势头不变。在进口方面，从1998年的268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5055亿美元，平均增长率达到15.5%。在2001—2012年、2013—2019年两个时间段内，服务贸易进口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9.0%和9.3%。在出口方面，从1998年的251亿美元增长到2019年2444亿美元，平均增长率达到12.1%。在

[1] 朱福林：“中国服务贸易发展70年历程、贡献与经验”，《首都经济贸易大学学报》，2020年第1期，第48~59页；江小涓：“服务全球化的发展趋势和理论分析”，《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第4~18页。

[2] 根据《2010年国际服务贸易统计手册》，商务部将服务贸易分作12个类别进行统计，分别为运输、旅行、建筑、保险服务、金融服务、电信、计算机和信息服务、知识产权使用费、个人、文化和娱乐服务、维护和维修服务、其他商业服务、加工服务和政府服务。

2001—2012年、2013—2019年两个时间段内，服务贸易出口平均增长率分别为16.5%和2.9%。可见，在2008年之前，中国服务贸易进口与出口在数量和增速上相差不大，但之后服务贸易进口增加明显快于出口，即服务贸易逆差增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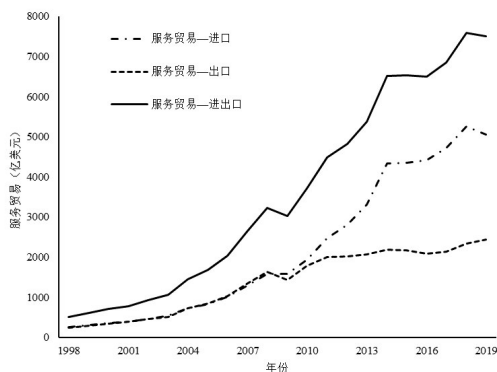


图2 中国服务贸易趋势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数据库。

本文进一步探讨在中国的贸易总量中服务贸易的占比。数据（见图3）表明，1998—2019年中国服务贸易进出口占全部贸易总额的比例为10%~15%。服务贸易进口占全部贸易进口总额比例在2003—2011年期间较为稳定，在2012年之后稳定增长，在2015年超过20%。相反，在服务贸易出口占整体贸易出口比例方面，存在整体小幅降低的趋势，从2001年13.8%下降到2019年8.9%。由此可见，在中国的国际贸易结构中，服务贸易进出口总额占比不足五分之一，且服务贸易进口占比高于出口占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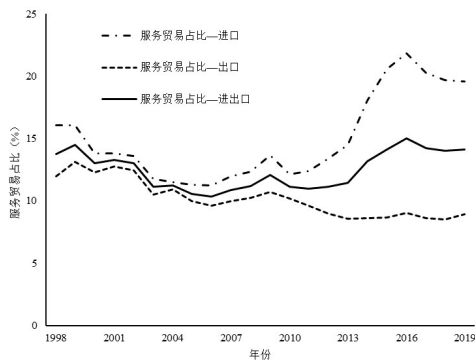


图3 中国服务贸易占比趋势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数据库。

## （二）贸易伙伴结构

在中国对外开放水平不断提高的同时，中国贸易伙伴格局也正在发生改变。在 2003 年之前，日本、美国、欧盟占据中国贸易伙伴前三的位置。2004 年，扩张壮大后的欧盟取代日本，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此后，东盟作为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在贸易总额上分别于 2011 年超越日本，2019 年超越美国，2020 年超越欧盟，成为中国最大的贸易伙伴。<sup>[1]</sup>中国的贸易结构在长期中呈现贸易伙伴多元化的趋势，并且自贸区的建设在很大程度上促进了中国对外贸易。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在 2010 年年初正式全面启动，日益拓宽了双方的经济合作领域，极大推动了双方贸易增长<sup>[2]</sup>，使贸易结构更加合理化。

虽然搁置、冻结了部分条款，CPTPP 在框架上依然是高水平的自由贸易协定，有利于加强各成员国之间的经贸联系和合作，促进亚太地区的贸易、投资。此外，CPTPP 现有成员国已然是中国的重要贸易伙伴，若中国加入该协定，能够进一步推动这种关系的发展。<sup>[3]</sup>本节将 CPTPP 现有成员国作为一个整体，加总相关统计数据，呈现中国与该贸易群体之间的贸易情况。<sup>[4]</sup>

首先，如图 4 所示，在中国与 CPTPP 成员国货物贸易方面，进口在 2001 年之前保持较小的增长速度，之后整体保持较快的增长。具体而言，1992—2001 年增长约 3 倍，从 205 亿美元增长到 670 亿美元。在 2019 年，这一数值达到 5589 亿美元。1992—2019 年中国与 CPTPP 成员国货物贸易进口平均增长率约为 14.0%，2002—2019 年期间约为 13.4%。在货物贸易出口方面，中国与 CPTPP 成员国货物贸易出口在长期存在较大的波动，但存在整体增长的趋势，1992 年、2001 年、2019 年的数额分别为 162 亿美元、952 亿美元、3935 亿美元。1992—2019 年、2002—2019 年的平均增长率分别为 21.2%、19.0%。在中国货物贸易的结构中，与 CPTPP 成员国的贸易总量占比在 20%~30%（见图 5）。其中，货物贸易进口占比高于出口占比。总体而言，若把 CPTPP 成员国当作一个贸易群体，其与中国货物贸易的份额在中国的贸易结构中占有重要地位。

[1] 根据相关数据，2020 年中国前五大贸易伙伴依次为东盟、欧盟、美国、日本和韩国，中国对上述贸易伙伴进出口分别为 4.74 万亿元、4.5 万亿元、4.06 万亿元、2.2 万亿元和 1.97 万亿元，增长率分别为 7%、5.3%、8.8%、1.2% 和 0.7%。

[2] 中国和东盟的贸易总额占世界贸易总额约 13%。

[3] 苏庆义：“中国是否应该加入 CPTPP？”，《国际经济评论》，2019 年第 4 期，第 107~127 页。

[4] CPTPP 于 2018 年底生效，本文仅以其成员国作为研究对象，说明其与中国的贸易情况。不意味着这些国家以往是一个经济群体，与中国存在特定的经贸关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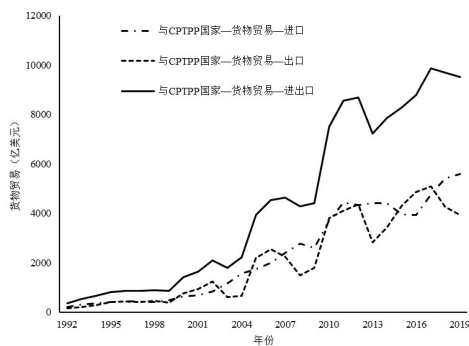


图4 中国与CPTPP国家货物贸易趋势

数据来源：UN Comtrade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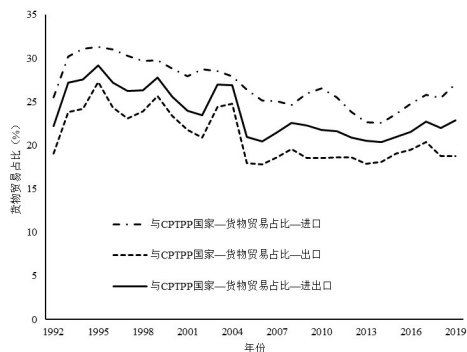


图5 中国与CPTPP国家货物贸易与中国货物贸易总量占比趋势

数据来源：UN Comtrade数据库。

在与CPTPP成员国服务贸易方面，2000年以后，进口和出口在整体上均表现出较快的增长速度。在服务贸易进口（见图6）方面，从2000年40亿美元增长到2017年481亿美元，平均增长率约为16.8%。从不同阶段来看，2002—2007年平均增长率约为27.2%，而2008—2017年的增速下降，平均增速约为11.7%。在服务贸易出口方面，其增长速度小于进口，从2000年53亿美元增加到2017年231亿美元，平均增长率约为9.9%。2002—2007年和2008—2017年的平均增长率分别约为18.7%、6.0%。服务贸易占比数据（见图7）显示，进口和出口占比均呈现先下降后上升的趋势。服务贸易进口占比从2000年11.0%下降到2014年6.3%，此后逐渐上升到2017年10.3%。服务贸易出口占比从2000年17.3%下降到2011年7.7%，之后开始稳步增长到2017年12.2%。以上证据表明，与CPTPP国



家之间的服务贸易在中国服务贸易结构中同样有着重要作用，且近年来的地位不断上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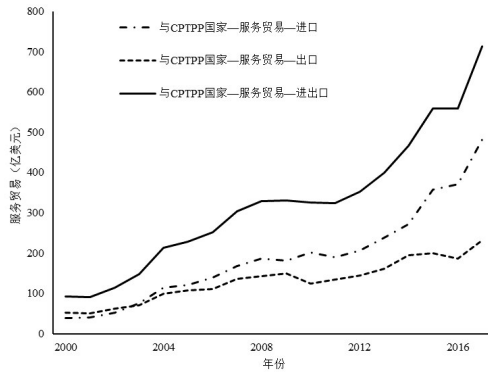


图6 中国与CPTPP国家服务贸易趋势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数据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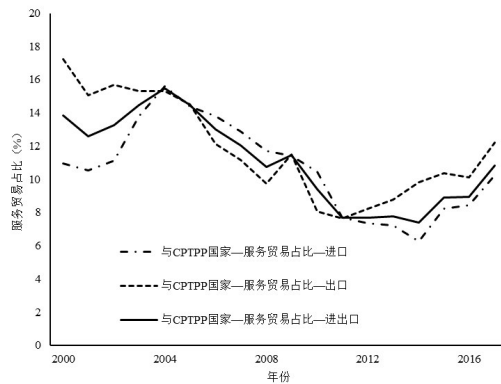


图7 中国与CPTPP国家服务贸易与中国服务贸易总量占比趋势

数据来源：UN Comtrade 数据库。

### CPTPP 与 RCEP 比较分析

RCEP是新时期中国扩大对外开放的重要平台，有助于中国进一步优化对外贸易和投资布局。积极考虑加入CPTPP更是中国不断与国际高标准贸易投资规则接轨的表现，能够助力中国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新体制，推动经济外循环。CPTPP冻结了部分原来的有关知识产权条款，保留了TPP中95%的条款，例如国有企业和指定垄断、劳工、环境等规则，仍不失为全球范围内最高标准的自

贸协定。相较而言，RCEP条款内容更注重与货物贸易相关的活动，而CPTPP更侧重与服务贸易相关的规则。本节就RCEP与CPTPP两者的主要差异进行比较，为下文的讨论提供参考。

第一，贸易规则适用性的差异。由于RCEP涵盖了更多中低收入国家，如缅甸、老挝，其多边贸易体制规则在追求高质量的同时也注重包容性，较为全面地考虑了不同成员国的利益。RCEP给予最不发达国家特殊与差别待遇，通过经济和技术合作条款对欠发达国家提供帮助。相较而言，CPTPP的贸易协定规则更加严格，在劳动和环境规则、竞争政策、国有企业、知识产权监管、互联网规则和数字经济等方面设定了更高的标准。但也需要指出，部分高标准规则在一定程度上为发展中国家对外贸易制造了隐性壁垒。

第二，关税水平差异。RCEP货物贸易零关税产品数整体上超过90%，且主要是立刻降税到零和十年内关税降低至零，并保持一定的农产品配额。<sup>[1]</sup>CPTPP的“货物的国民待遇和市场准入”章节规定成员国应加快减让至零关税，整体而言关税削减程度高于RCEP。此外，相较于单独签署的双边贸易协定，该协定关于关税的相关规定更加全面，不仅使成员国之间形成统一标准的关税取消规则要求，而且对于某一成员的关税减让承诺的关税优惠将自动赋予其他所有成员。<sup>[2]</sup>

第三，市场准入差异。RCEP使用了正面引导和负面清单相结合的规定<sup>[3]</sup>，其中各成员国均采用负面清单方式对制造业、农业、林业、渔业、采矿业5个非服务业领域投资作出较高水平开放承诺。CPTPP全部采用负面清单模式，要求各成员国除了限制或禁止开放的领域，应当以一般自由化措施予以全方面开放，如金融服务和投资。由于要求开放的领域更多、程度更高，其对跨国投资的推动作用更强。<sup>[4]</sup>

第四，涵盖领域差异。在内容覆盖度方面，RCEP的谈判领域和议题仍以传

[1] 由于基准税率相对较高，RCEP成员国关税下降幅度较大。据测算，马来西亚、泰国关税降幅最高，中国、日本、韩国关税降幅中等，新西兰、文莱关税降幅最低。

[2] 冯巧根：“CPTPP的核心条款及其对企业利益的影响——会计角度的观察”，《财会通讯》，2020年第21期，第3~13页。

[3] 在服务贸易规定方面，日本、韩国、澳大利亚、新加坡、文莱、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7个成员国采用负面清单方式承诺，中国等8个成员国采用正面清单承诺，并将于协定生效后6年内转化为负面清单。

[4] 目前，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主要集中在与进出口贸易相关的服务业领域，而非制造业领域。参见：田巍、余淼杰：“人民币汇率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贸易服务型投资视角”，《国际经济评论》，2019年第5期，第44~56页。

统议题为主，在规则上有所限制。相较而言，CPTPP 将更多高水平自由化规则纳入贸易框架中，包括知识产权保护、环境标准、劳工标准、国企改革等。例如，在争端解决条款方面，采用建立磋商、专家组仲裁形式，完善了监督机制，提高了争端解决的效率。CPTPP 创新性地对国有企业规定了相应的规则，确保了竞争中立原则。

第五，服务行业开放差异。相较于 RCEP 而言，CPTPP 不仅降低了货物贸易成本，更是在服务业、知识产权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贸易标准，促进各成员国提高开放程度，为各方的优势服务产业构建了更自由的国际市场，为服务贸易提供了便利。尤其是在电子商务章节，强调了贸易的数字性质，在合理合法的基础上，促进信息和数据在更大范围内的流动和应用。同时，重视数字贸易中数据保护等规则，有助于促进区域内数字经济的发展。<sup>[1]</sup>

### 加入 CPTPP 的主要挑战

在签署 RCEP 以后，中国自贸区网络含金量进一步提升。通过 RCEP，中国与日本建立了自由贸易关系，这是中国首次与世界前十的经济体签署自贸协定，是实施自由贸易区战略以来取得的重大突破。但也应该看到，在高水平的自由贸易规则框架下，中国依然存在需要解决的问题。当前，CPTPP 的推进由日本主导，但日本对中国的加入表示出消极的态度。2021 年 1 月初，日本首相菅义伟公开表示：“CPTPP 规则要求成员国有相当高的市场开放水平，在现有制度下中国想要加入有难度。”一方面，日本的顾虑来源于对政治因素的考量，例如美国尚未明确是否重返该协定。另一方面，客观反映出中国对外贸易在某些方面还存在不足。本节基于当前国内外经济发展格局和 CPTPP 规则的特点，对中国加入该贸易协定的阻碍，以及解决阻碍的能力进行剖析。

第一，国企改革问题。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国有经济是弥补市场缺陷、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经济基础，是国民经济的主导力量。但是，国有企业需要平衡盈利和公共政策需要之间的关系，这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国有企业的缺陷，进而演化为政府对市场资源的直接配置，以及对国有企业生产经营显性的或隐性的干预。CPTPP 首次将国有企业和垄断作为单独章节，构建了独立、高标准

[1] 当前，数字贸易是全球服务贸易的焦点之一。以中国为例，当前数字经济占中国 GDP 的三分之一，中国出现了一批在全球范围具有竞争力的信息技术企业，且数字经济在未来的重要性会进一步更高。

的规则体系，对国有企业界定、非歧视对待和商业考量、非商业援助、透明度、管辖权等规则进行了详细的阐述，旨在给予跨国公司参与公平市场竞争的机会。自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国企改革的进程从未停止，特别是中共十四届三中全会确立了建立按照“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改革方向。近年来，中国深化以政企分开、政资分开、特许经营、政府监管为主要内容的改革，强调国有企业要真正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自我发展、自我约束的独立法人实体和市场竞争主体。2020年6月，《国企改革三年行动方案》通过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审议，标志着中国国企改革进入新阶段，在国企混改、重组整合、国资监管体制改革等方面将进行重要调整。可以看出，中国长期以来不断深化改革，逐步将国有企业的改革方向和目标与竞争中立原则趋向一致。

第二，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中国知识产权保护法制建设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相关法律制度的基本框架主要在那时形成。但随着经济发展和技术升级，一些知识产权保护问题逐渐显现，主要包括：虽然已具备相对健全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但针对某些产业领域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不够完善；某些地区地方保护主义较为严重，且对于知识产权侵权行为的执法力度不强。自《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TRIPs）诞生以来，知识产权保护的地位与货物贸易、服务贸易相当，全球对于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给予了前所未有的关注。出于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及保护国内企业合法权益的考虑，中国一直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主动完善知识产权保护法律体系，坚定不移奉行互利共赢的对外开放战略。在2018年博鳌亚洲论坛上，习近平主席表示将知识产权保护作为扩大开放的四个重大举措之一。同年11月，习近平主席先后在首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与亚太经合组织第二十六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上，强调了中国将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在具体举措方面，中国在2003年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条例》，旨在实施知识产权海关保护。2019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外商投资法》是对之前外商投资相关法律法规的完善，更加注重外商投资的知识产权保护问题。以上行为和能力的表现，表明中国坚持对外开放基本国策的表现，表明中国致力于加大保护知识产权力度，营造更具吸引力的投资和营商环境，顺应经济全球化发展大势，把握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大方向。

第三，劳工规则问题。由于国际分工的必要性，贸易协定中关于劳工方面的标准也在不断提高。一些发达国家认为，中国由于劳工标准宽松，工会力量薄

弱，无法有效保护劳工的权利，产生了劳工低报酬的现象。进一步，劳动力价格的比较优势转化成出口竞争优势，产生了劳动力倾销。因此，这些发达国家执意在贸易协定中制定高标准劳工规则，以限制中国等发展中国家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发展。<sup>[1]</sup>目前，中国《劳动法》大部分条款与国际劳工组织标准相一致，且不断健全和完善相关的劳工制度。在全球贸易新趋势下，中国正在加紧推进劳工标准改革，推动劳动法制的建设。同时，也注重培训、维护资方利益并加强劳工合作，使劳工状态得到了极大改善。

第四，环境保护问题。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之一，可持续发展是各国关注的焦点。随着经济发展，无约束的工业生产造成了严重的环境污染，进而出现全球气候变暖、资源枯竭等问题。改革开放以来至21世纪初期，中国经济发展方式一直以粗放型经济增长为主，存在资源利用效率低、污染排放强度高问题。此外，中国之前签署的自由贸易协定对环境保护的涵盖范围较小，对贸易伙伴之间的环境保护合作的重视程度不足，整体上对环境污染的约束不足。CPTPP在环境保护方面作出了较大的创新，不仅从范围、义务、约束三个维度制定了高标准的环境保护规则，并且单独设置了关于环境保护国际合作的相关条款，将环境条款纳入争端解决机制，提高了协定的效力。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深入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加快推进经济增长方式由粗放型向集约型转变。“十三五”期间，“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写入了党章，生态文明写入了宪法，政府不断加大对环境保护的重视程度和工作力度，越来越多地方把生态文明建设和加强生态环境保护作为机遇和重要抓手。“十四五”规划建议中提出，中国将加快推进绿色低碳发展，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到峰值的行动方案。2020年9月22日，习近平主席在联合国大会上表示：“中国将提高国家自主贡献力度，采取更加有力的政策和措施，二氧化碳排放力争于2030年前达到峰值，争取在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种种事实和行动表明，中国在全球环境治理方面起到表率作用，力争早日推进环境治理体系的完善。

第五，数据流动问题。数据是数字经济时代的最大资源，不同国家基于隐私安全、市场竞争等因素考虑，在数据管理的理念和措施方面存在巨大差异。为了促进数字贸易发展和维持数字产业优势，一些国家极力推动跨境数据自由流动以及数据存储非强制本地化，并限制政府的数据保护主义行为。也有一些国家更加

[1] 陈志阳：“多双边贸易协定中的国际核心劳工标准分析”，《国际贸易问题》，2014年第2期，第56-64页。

关注隐私保护和网络安全，将公民的个人隐私数据存放于可信度高的服务器。与此相对应，在国际贸易中，一些国家要求数据存储本地化以加强本地控制和数据监管，并限制跨境数据流动，从而形成一定的贸易壁垒。CPTPP在电子商务章节的条款绝大部分保留了TPP的内容，在一定程度上是美国对于数字贸易需求的体现<sup>[1]</sup>，是迄今为止在电子商务方面规定最全面的自贸协定。<sup>[2]</sup>目前，中国主要基于《网络安全法》出台相关法律法规对跨境数据流动进行监管，但缺乏系统性的跨境数据监管与保护体系。2019年，国家互联网信息办公室就《数据安全管理办法（征求意见稿）》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旨在不断完善中国数据跨境流动管理政策体系。现阶段，中国信息技术的发展与应用走在世界前列，也有志于在跨境数据流动规则建设时期，积极参与全球数字经济治理体系的建设和改革，维护国家利益、保证国家安全以及争夺国际规则的话语权。

### 加入CPTPP的对策建议

CPTPP被认为是当今世界上最高标准的自由贸易协定，在制定规则的过程中坚持高标准、严要求且顺应国际贸易新趋势。基于前文讨论，中国在某些方面具有优势，且具有迎接全球经济变化挑战的能力。为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加入CPTPP，中国需要继续深化改革，推进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本文认为，现阶段所需完善的工作主要如下。

第一，推动货物贸易自由化。首先，进一步降低进口关税，促进进口贸易的发展，以满足国内消费市场需求。其次，尽可能地在自贸协定的谈判过程中强调中国实行区域的累计原产地标准，将协定中的若干个或所有受惠国（地区）视为一个统一的经济区域，提高优惠税率的利用率。<sup>[3]</sup>此外，应做好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的工作，以优化营商环境。适度优化进口进关的手续，降低通关成本，以促进商品更好地流通。

[1] 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服务贸易占比最大的国家。根据WTO数据，2018年美国服务贸易总额13876亿美元，占全球服务贸易份额超过12%，约为第二大服务贸易国中国、第三大服务贸易国德国的服务贸易总额的总和。

[2] 时业伟：“跨境数据流动中的国际贸易规则：规制、兼容与发展”，《比较法研究》，2020年第4期，第173-184页。

[3] 余森杰、张睿：“以我为主，为我所用：中国应积极主动寻求加入TPP”，《国际经济评论》，2016年第2期，第39-56页。

第二，推动服务贸易加快发展。首先，全面推进负面清单模式，争取早日与 CPTPP 接轨。持续提升中国服务贸易的对外开放程度，降低服务贸易壁垒，吸引来自发达国家服务业的高级要素供给。适度放宽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市场准入以及相关限制措施，推动价值链升级。此外，出台配套政策鼓励服务贸易企业加速进入数字化时代，充分发挥服务业带动产业资金流动的作用，合理引导资本更多地投向创新研发领域，从根本上解决服务贸易结构失衡问题，让服务贸易成为中国外贸增长新亮点。

第三，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不断扩大投资开放领域。首先，以“准入前国民待遇和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为依托，鼓励服务业企业与外资企业开展公平市场竞争，增强服务贸易企业竞争活力。借鉴在自由贸易试验区对于该模式实践的经验，并有序地在全国范围内推广。其次，以竞争政策为基础，不断改善市场环境，充分发挥竞争市场环境对于服务要素优化配置的关键作用。同时，提高贸易投资政策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为国际投资搭建良好平台。

第四，切实做好知识产权保护工作。首先，积极优化国内法制环境，加大知识产权保护力度，鼓励企业创新，缩小与发达国家在核心关键领域的差距。其次，不断完善跨国合作的安全审查制度及外资信用监管系统，以提高监管效率。同时，加快修订国际运输双边、多边协定，推动与相关国家在技术标准、单证规则、数据交换等方面开展合作，以推动技术标准的统一。

第五，深化国企改革。首先，规范国有企业监管体系，基于竞争中立原则，营造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其次，应参照相关贸易协定关于国有企业的定义，按照市场地位或竞争程度分类推进国有企业分类管理，提高国有企业的整体效率。深化国企混合所有制改革，构建符合现代企业治理的、有竞争力、能够培养竞争力和创新力的治理体系，增强国有企业活力，培育其国际竞争力。

## 结 论

当前全球化的结构与形态发生了变化，但是基本的方向与趋势并没有改变。签署 RCEP 以及积极考虑加入 CPTPP 有助于中国顺利地实施双循环——帮助推进外循环、帮助引领内循环。

本文呈现了中国货物贸易及服务贸易的大趋势，近年来中国货物贸易和服务贸易总额整体上快速增长。服务贸易占中国贸易总额长期以来不足五分之一，且

存在逆差增大的趋势。进一步，将CPTPP现有成员国作为整体，展现了中国与这些国家的贸易情况。在货物贸易方面，中国与CPTPP成员国进出口贸易数额总体上保持平稳增长的态势，占中国货物贸易份额为20%~30%。在服务贸易方面，服务贸易进口增长速度大于出口增长速度，占中国服务贸易份额呈波动变化。

CPTPP和RCEP在贸易规则包容性、关税要求、市场准入、协定涵盖领域等方面存在差异。中国加入CPTPP的挑战主要有以下方面：国企改革有待改进、知识产权保护不足、劳工规则不够完善、环境污染较为严重、数据流动缺乏有系统的管理体系。同时，中国有能力，也有决心推动改革，在多个方面持续推进相关工作，以抓住战略机遇期，推动双循环的实施。

最后，本文基于以上讨论提出了相关建议。第一，降低进口关税，做好贸易便利化、投资便利化，推动货物贸易自由化；第二，积极地采用“负面清单”模式，尽快实现从“正面清单”向“负面清单”的转换，推动服务贸易加快发展；第三，全面实施准入前国民待遇加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不断扩大投资开放领域；第四，协调自身经济发展，建立高规格的知识产权保护制度；第五，深化国企改革，基于竞争中立原则营造良好的市场环境，提升国有企业的核心竞争力。■

（责任编辑：崔秀梅）